

廖仲愷先生文集



廖仲愷先生文集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廖仲愷先生文集

定價：精裝新臺幣 二一〇元 美金 六七元
平裝新臺幣 一八〇元

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出版

經銷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一四六一八一號

承印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一八一八號

臺北縣新店市大坪林寶強路六號

廖仲愷先生文集

凡例

一、廖仲愷先生（一八七七——一九二五）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從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廖氏無不熱心參與革命行動，且兼具理財家、實踐家與革命家的典型。其生平論述、譯作，表現了不平凡的經歷與思想，也證明他是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

二、本文集盡出本會庫藏有關廖氏函牘、著述等資料，全編概分為五類：

（一）譯著：民報、建設、星期評論、民國日報所載廖氏譯文、著作，均予輯入。譯文間有案語，亦可窺見生平思想演變的一斑。（二）函電：含民國元年以後往來公私函電，顯示廖氏之革命活動與經歷。（三）公牘：含呈文、佈告，足以說明廖氏擔任財長、省長期間之苦心孤詣。（四）演講：包括談話及演說，在黃埔軍校黨代表任內的演

講，說明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五）詩詞，以雙清詞草為主，亦可見其心跡。

三、本文集各類之編排，悉以時間先後為序，意在便於檢索，時間不明者，依類編次。

四、各類資料來源均註明出處，以便查考。

五、文集前附照片四幀、傳略一篇，以供參閱。

六、文字之輯錄，闕漏當所難免，如有補充訂正，最為歡迎。

傳 略

一、從求學到參加革命：廖仲愷，原名恩煦，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父竹賓先生，是旅美的華僑，他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西曆一八七八年）三月十日生於美國。少年時，就在美國讀書，受外國教育。可是他的父親是一個愛護祖國的人，雖遠離國門，其教育子女，仍然不忘國學。因此他的中西學問，那時就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十七歲時回國，在香港繼續讀英文，據他自己說，他在香港得到的英文學識，比僑美時得到的還要多些，可見用功之勤，進步之快。

二十歲，和夫人何香凝女士結婚。那個時候，清廷的外交失敗到了極點，內政也腐敗到了極點，革命的怒潮，震撼了全中國，而日本留學界，尤隱然居革命的重心。他是個有大志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發生大大感觸，便對何女士說：「國家危險至此，我們豈能坐視？日本留學界朝氣蓬勃，志士雲集，我也想東渡求學，結交革命賢豪，共圖大事。惟學費無着，奈何？」何女士慨然說：「十年之內，你儘管放心，我可以把我的奩飾變賣，助你成行。」於是就東裝起程東渡。次年，何女士也到東京，夫婦刻苦勤儉，維持數年。他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專攻政治經濟學。

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

聯合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仲愷和他的夫人也毅然加入，開始獻身於革命事業。他認為革命貴在力行，便和同志組織軍事訓練團，每天在大森場學習射擊及製炸彈術，以備起事之用。次年，國父由南洋回日，船經吳淞停泊，法國駐華武官布加卑來求見，傳達其國政府贊助中國革命之意。國父回到東京，便派仲愷到天津去，幫助布氏做調查工作，數月後回來，繼續讀書。畢業後回國，助邊防督辦大臣陳昭常、會辦大臣吳祿貞，辦理延吉的交涉事宜。延吉能從日本人的手裏收回來，他的功勞不少。其後，陳昭常調吉林巡撫，他仍居陳氏幕中。

二、大顯革命理財家的本領：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義，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克復，胡漢民任都督，仲愷被請回來管理財政。當時廣東財政非常紊亂，實不好下手，但他憑着高深經濟學識和敏捷的手腕，從容整理，有條有緒，不到幾個月功夫，已使收支相抵，解職時，省庫居然有餘財了。這是他以其所學貢獻於革命事業的第一步。一露頭角，便有如許成績，同志都為之驚嘆不已，但是他的大顯身手，還在後面呢！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國父避居日本東京，第二年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討袁，他始終追隨左右，贊襄甚力。國父知道他是理財能手，便命他和張人傑共掌財政。袁世凱死後，共和重建，他隨國父回到上海。六年，國父率海軍南下護法，因陸榮廷等從中作梗，不能貫徹主張，次年便解職返滬，專心辦理黨務。又命同志創辦建設雜誌，努力宣傳，他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發表文章很多。他在日本專攻政治經濟，造詣很深，這時所做的文章，大都是根據純粹的政

治經濟學理，來發揚國父的民權民生主義。關於民權主義方面，他翻譯了一本名著，叫做全民政治，介紹民權思想，非常得力，國父後來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還提起來稱贊過。

他對於民生主義的了解，更為深刻。他很明瞭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次殖民地國家，只有發展產業，纔有前途，產業發展的可能結果：一是資本主義的路；一是社會主義的路。他以爲中國應該選擇後一條路。他說：「中國在這時代，自己經濟的基礎這樣薄弱，而所受國際經濟的壓迫這樣深重，若要有所樹立，除非是建一社會主義的國家，依科學的組織，用集合的方法，解決生產問題不可。生產問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欲達到社會主義的路，只有實行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和平等地權的兩個方法，因此他發表了一篇平均地權的文章，說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國父的民生主義演講稿尚未行世，他這篇文章是很有貢獻的。他又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消費合作社概論，主張在節制資本方法未能實行以前，先用合作社的辦法，來補救資本主義發達的流弊，這也是很有卓識的。

九年，粵軍由閩回師，桂系敗走，廣州光復，國父由滬返粵，恢復軍政府組織。次年四月，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將軍政府改組爲正式政府，國父被舉爲大總統，任他做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因遭陳炯明妒忌，乃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十年，國父親率北伐軍出發廣西，陳炯明時爲廣東省長，已萌異志，對北伐軍餉糈，多方留難，幸他毅然以籌款接濟自任，北伐軍費纔得勉強維持。到十一年四月，卒因陳炯明的破壞，國父不得不率師折回廣東，把陳炯明

的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兩職免掉，任伍廷芳爲廣東省長，他仍繼續任財政廳長，數天之內，便籌集現款三百萬，交給政府，作爲北伐軍經費，北伐軍乃得改道出發韶關，向江西進攻，連下贛州、吉安。那時，國父因陳炯明態度有異，返省坐鎮，不料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突然在廣州叛變，舉兵進犯總統府，國父倉猝登永豐艦戡亂，歷二月方始脫險抵滬。事變前一天，他被陳計誘到石龍，囚禁六十二天纔釋放。

十二年二月，各方軍隊把陳炯明打敗，克復廣州，共迎國父回粵，復任大元帥職。十三年，北方發生戰爭，國父想乘機北伐，便任他做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軍需總監，負後方轉輸全責。那時廣東局面，非常困難，而財政問題，癥結尤多，誠如他自己所說：「粵省財政，久陷於分裂，握軍柄者，各就防地自籌軍食；掌度支者，形同守府，挹注無從。於是佔有防地之軍隊，類有餘糧；轉戰前敵者，或以缺乏地盤之故，給養無出。肥瘠懸殊，勞逸亦異，設有徵調，猜嫌四起。」又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粵省雖號富裕，而軍興以後，財政久陷分裂，釐捐糧稅，悉爲各軍截收；賭餉烟捐，亦由各軍支配，是全省稅收，業已瓜分豆剖，點滴無遺，計吏職權，情同告朔，挹注勢有不能。」但他認爲北伐是革命的根本大業，不能因財政困難而中止，他寫信給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很沉痛的說：「現在強鄰環伺，而市儈軍閥，盤據北省，方且日肆屠戮，禦侮討賊，吾輩負責至重，千鈞一髮，實非急起直追，無以應事機而拯危亡。唯細察粵局，又非統一財政，無以作士氣，而一軍心。」所以便不顧一切，毅然把所主張

的統一財政計劃公佈出來，各方大表歡迎，都認為是廣東財政前途的曙光，但自私自利的專橫軍人，則反對破壞不遺餘力，致使這種偉大計劃終成畫餅，他自己且因此種下後來不幸的禍根！

三、勦助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自從民國成立以後，袁世凱一心想做皇帝，對革命黨人盡其威脅利誘的能事，黨人在他的毒辣手段之下，變節的變節，退縮的退縮，革命大業幾乎中斷。國父痛心之餘，便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精神，來和惡勢力奮鬥。但因紀律太嚴，有一部分同志不願參加，所以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袁世凱死後，北方局面仍是一團糟。六年國父南下護法，自己可靠的力量，只有海軍部的幾隻軍艦，陸軍則全在桂系手裏。政治方面，國會議員又多懷異見，不能合作，結果為桂系和政學系所逼，辭職去上海。他這次十分痛心之餘，深深的感到，依靠他人終究不是辦法，要完成革命大業，須要黨的本身有力量，要黨的本身有力量，首先須從健全黨的組織和振作黨的精神做起。那時，蘇俄共產黨的革命剛剛成功，給他很大的興奮，他把他引為中國革命的好朋友，便拍電去祝賀。蘇俄也屢次表示，對於弱小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願予無條件的援助，因此雙方便慢慢發生接觸。十一年，國父督師桂林時，蘇俄派專使馬林來致敬，對於中俄兩國革命的關係，也廣泛地談及。同年六月陳炯明的叛變，給國父的刺激更深，以素來視為黨的基本部隊，竟有這樣悖逆的舉動，豈不是證明了黨的生命已陷入了危險的地步嗎？這使他改組黨的決心更加堅決。這中間，勦助國父計劃最力的，仲愷也是其中之一。十一年冬，蘇俄復派專使越飛來上海謁國父，商定中俄兩國革命切實合作，連名發表了有劃

時代意義的重要宣言。越飛離上海到日本養病，國父便派仲愷同行，他在日本和越飛住在一塊，天天討論，非常契合，回國後，便力促聯俄容共計劃的實現。十二年一月，國父在上海召集黨務改進大會，改訂黨章，對黨務做初步的改進。二月廣州光復，陳炯明敗走，國父由上海回到廣州，計劃徹底改組黨務，十一月就發表改組宣言，接着十三年一月又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順利結束，黨務改組圓滿完成，國民黨從此走上了成功的坦途。在黨務改組當中，他是始終勤助最力的一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國民黨成功的偉大文獻，其中他曾貢獻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代表大會閉幕後，他被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立刻把廣東省長的職務辭去，一心辦理黨務。

黨的改組成功，黨的幹部力量亟待培養，國父於是派他和蔣介石先生共同籌備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黨軍幹部人才。那個時候，廣東為一班專橫軍人割據，弄到整個局面不生不死，他們認為黨軍的建立，和他們自私自利的企圖是根本衝突的，便聯合起來，千方百計，設法破壞，使他和蔣先生感到有無從下手之苦，甚至連要找個地方做籌備辦事處也不容易，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但他倆憑着堅定不拔的信心，和不屈不撓的勇氣，來與惡劣環境苦鬥，陸軍軍官學校畢竟在黃埔成立了。蔣先生任校長，他任學校的黨代表，常常到學校去做精神訓話，把三民主義灌輸到學生的頭腦裏去，使每個學生都成為健全的革命分子。後來把這些革命幹部人才來組織陸軍教導團，奉行主義的黨軍一批一批地產生了，其後征東江，討楊劉，統一廣東，乃至出師北伐，

統一全國，都是這時奠下的基礎。

他對於這次黨的改組，是具有絕大信仰和決心的。當時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對他說：「同志中反對改組的人頗不少，你應該考慮考慮！」他堅決的答道：「我爲國爲黨，無論何人反對，我都不怕，就使殺死我，亦所不計。如果天能假我三年功夫，以從事國民革命，成績必有可觀！」他對黨的功勞如何偉大，我們最好引用和他共嘗艱苦的 蔣介石先生的話來說明， 蔣先生說：「廖先生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在民國十三年輔助 總理改組本黨，創造本黨和中國革命的新生命。當時如果沒有廖先生，如果沒有他那樣的決心和熱誠來輔助 總理，恐怕十三年本黨的改組，難得有那樣徹底精神和偉大的結果。本黨因爲有十三年的改組，成功了一個嶄新的組織，孕育出一種新生的力量，所以能够在十五年出師北伐，十七年統一中國。這種革命的進展，廖先生就是最初慘淡經營，領導我們一般同志刻苦奮鬥的人！」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四、領導民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國父的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話，仲愷認識最深，而奉行也最力。國父的聯俄政策，可說是他促成的，而喚起民衆的工作，尤爲他的努力中心，他曾說：「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及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資本主義者戰；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國資本主義者則已，否則必先與國內軍閥戰；吾人其不欲打倒國內軍閥則已，否則必先喚起全國國民共圖國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

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這幾句話何等斬釘截鐵！又說：「我們可以說，那一派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革命派；那一派反對較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反革命。我們依着現狀，可以說，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公敵。那一派人代表民衆來打銷這兩種力量便是革命派。佔我國人口最多的是農工階級，那一派人替農工階級打銷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並壓迫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這種認識又是何等透澈！

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主持民衆運動工作，尤其特別着重農工兩階級。他認爲民衆運動，若祇要求民衆加入本黨做黨員，猶不可靠；必要使他們明瞭何以要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之成敗與他們有何種利害關係，他們方有參加革命之希望，此爲最要之點。所以第一步便要做宣傳工作，都市工人智識較高，可以接受一般黨員的宣傳；鄉村農民智識淺陋，對他們宣傳，却非有特殊的技術不可。因此他便幫助國父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來訓練宣傳的專門人才。宣傳工作做到了，民衆醒覺了，接着便須指導他們組織起來，於是工會、農會，便如雨後春筍般產生，民衆的力量圍繞着國民黨蓬蓬勃勃地生長了！

全國民衆在國民黨的直接領導或精神影響之下，普遍地醒覺起來了；民衆運動的狂潮，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面前像排山倒海地洶湧而來，使他們感到脚忙手亂，不知爲計，只有對中國民衆加緊壓迫，加緊摧殘，因此釀成了許多血淋淋的慘案。而最使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是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因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紅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南京路對遊行民

衆的大屠殺，這便是反帝運動史上有名的「五卅慘案」。當時廣州國民黨的革命政府，是中國民衆解放運動的明燈，帝國主義者和國內軍閥視爲眼中釘，必欲消滅之而後快，一切毒辣手段，都赤裸裸地使用出來。革命政府對付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這種聯合攻勢，便是領導民衆起來施行反擊，在革命政府的領導者中，仲愷便是最主要的一個。十四年六月，帝國主義者和楊希閔輩互相勾結，謀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政府靠着軍事的力量和民衆的擁護，僅僅幾天功夫，便把反動勢力削平了。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市民七萬餘人起來響應上海慘案，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至沙基，沙面租界裏的英兵首先開槍掃射，接着江面的英、法、葡砲艦也開砲轟擊，當場擊斃羣衆五十餘人，擊傷一百七十餘人，中國民族的血史又新添了一頁。革命政府便立刻宣佈對英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同時又領導香港的工人起來罷工，全部退回廣州，使香港成爲一個死島，結果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中國民衆的面前屈服。領導工人罷工最勇敢不屈服的，便是仲愷。他對罷工委員會代表說：「諸君此次罷工，是爲國家民族，不顧一切而奮鬥，比兵士去打仗，尤爲難能可貴。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若果一旦死了，比之士兵衝鋒陷陣，尚覺得更有精神，有毅力，令人欽佩。所以諸君此次奮鬥，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吳，什麼都大！」又說：「在政府方面，盡力爲全民而爭，在黨方面，也出盡全力而爭。所望全體工友一致奮鬥！」可見他是怎樣的熱誠！

革命政府在全民衆的擁護之下，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無論如何陰謀破壞，始終是不能撼動絲毫

的，這個功勞，我們第一個就要數到仲愷！

五、爲國民革命而犧牲：仲愷是最勇於負責的人，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政治方面，他先後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長、財政廳長諸要職，努力消滅專橫軍人的割據局面，以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奠定了國民政府的基礎；在黨務方面，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領導民衆與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搏鬥，勇往直前，一點不退縮，不姑息，不妥協。因此，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派仇視國民黨和革命政府者，尤痛恨他個人，認爲欲消滅國民黨和革命政府，尤必先從他下手，他的一身便成爲反革命勢力的衆矢之的了。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他偕夫人何女士從東山寓所驅車到中央黨部去開會，中途遇着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秋霖，同載而行。車到門口停下，他和秋霖先下車，入門登至石階第三級時，突然騎樓下跳出暴徒二人，向他開槍轟擊，大門鐵柵內也有暴徒同時發槍，共二十餘響，他身中三彈，俱中要害，當場仰面倒地，不能作聲，氣息僅存。秋霖也中一槍，帶傷避入宣傳部辦事處。何女士已驚慌倒地。時隨行衛兵三人尚在門外，聞槍聲纔趕入內，舉槍向兇手追擊，中其一人，餘均奪門而逃去。事稍定，大家急把他和秋霖扶上汽車，送去東川馬路公醫院，他因受傷過重，途中卽已斃命，秋霖則兩天後也不治而死。出事前數天，何女士曾對他說：「外面謠傳有人要行刺你，以後何不多添幾個衛兵？」他只冷笑道：「我一生沒有負黨、負國、負人，祇盡力爲民衆謀利益，何畏人仇？而且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防也不勝防，倘要暗殺，由他去罷！」遇害前一天，又有人以正確消

息報告，他復慨然說：「際茲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爲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真不料竟遭兇徒的毒手！他的死，距 國父逝世僅整整五個月，也是 國父逝世後黨國的一次最大損失！

無疑的，仲愷是爲國民革命而死，是死於反革命勢力的手裏，反革命勢力對他的逼害，即無異對國民黨和革命政府的逼害，可是他遭毒手以後，反革命派却又造謠言，說他是共產黨，他的死，是共產反共產爭鬥的結果，反革命派造作這種謠言的用意，顯然是在掩護他們的罪惡，和企圖分化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現在雖然已經事過境遷，但這件事以不但關係他個人，而且在黨國史上關係也很重大，我們覺得還有替他辨別真相的必要。

中國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伴着改組的成功，產生了黨的三個政策，就是聯俄、容共、扶植農工，這都是本黨總理 中山先生親自決定的，實具有不可能動搖的時代意義。關於聯俄容共的態度， 國父和蘇俄專使越飛在上海共同發表的宣言中說得明白：「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就是說，中國所需要而且唯一可走得通的路，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如果蘇俄政府願意以平等的態度，對中國國民革命做友誼的援助，國民黨自然樂予接受。同樣，對於共產黨，如果他願意